

宫哲兵与千家峒

——评《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

彭兆荣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0)

[中图分类号] T73/77.62 (33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01)02-0153-004

Mr. Gong Zhebing and Qian Jiadong

——A Comment on "Movement of Qian Jiadong and Birthplace of the Yaos"

Peng Zhaoro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2001年的5月, 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宫哲兵的新著——《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听到这个消息, 我非常高兴, 并且回忆起我与宫哲兵的相识与友谊。

1990年6~7月间, 在法国的图鲁兹举行第三届国际瑶族研讨会。其时我恰好在法国留学, 我的法国老师雅克(Jacque Lemoine)教授正好继任国际瑶学会主席一职(第一任为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 作为学生, 我责无旁贷地参与了筹划此次会议的许多工作。其中有一项任务便是负责接待来自祖国的瑶学专家, 在这些学者当中就有宫哲兵教授。他的大会发言《千家峒运动和千家峒故地的发现》的文字翻译也由我完成, 他千里迢迢从中国带去的瑶族文物上的文字符号则由我和卢汇博士共同翻译。这算是我对宫哲兵教授和他的千家峒研究最为直接的认识契机。其实, 早在此前八年, 即1982年, 他就已经开始了瑶族千家峒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 并到许多国家以“千家峒运动”和“女书的发现”为题讲过学, 很是轰动。海内外新闻媒体就此也多有报道。之前我虽耳闻, 却无缘与之谋面。

在此后的几年里, 由于国际瑶学研究成为一个“热点”, 每一年都要举行一两次瑶族研讨会, 加之我回国后继续从事苗—瑶国际化的人类学研究, 因此经常有机会与他碰面, 或泰国清迈、或广西贺县、或云南河口……除了开会, 也少不了经历些“文化探险”。没道理, 他生来就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在泰国、在云南, 只要跟他在一起, 都不缺少文化刺激和生命体验。我想, 这种文化刺激与生命体验正好是人类学田野作业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质和必须经历的“通过礼仪”(The rites of passage)。既然大家为此志同道合, 学理上便成了朋友。加之性格互补, 彼此宽容, 情理上也成了朋友。

收稿日期: 2000-9-18。

[作者] 彭兆荣(1957-), 男, 福建人,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人类学会副秘书长, 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在此后的几年里,由于国际瑶学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每一年都要举行一两次瑶族研讨会,加之我回国后继续从事苗—瑶国际化的人类学研究,因此经常有机会与他碰面,或泰国清迈、或广西贺县、或云南河口……除了开会,也少不了经历些“文化探险”。没道理,他生来就是一个爱弄险的人。在泰国、在云南,只要跟他在一起,都不缺少文化刺激和生命体验。我想,这种文化刺激与生命体验正好是人类学田野作业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质和必须经历的“通过礼仪”(The rites of passage)。既然大家为此志同道合,学理上便成了朋友。加之性格互补,彼此宽容,情理上也成了朋友。

记得在1993年初春,四位朋友(除我和哲兵外,还有徐杰舜教授、徐新建教授)窝在昆明的一家很低档的小旅馆里商议着将“千家峒”和“女书”研究以团队参与的形式进行合作,开心一把。离别时,大家还信誓旦旦,说此后每隔两年四个人还要轮流作东再聚,很一点千家峒十二姓瑶人离开故地时发誓将来再到千家峒的味道。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未能就这两个学术课题合作,也没能兑现每隔两年的一次聚首。其中的“错”大约不在哲兵教授身上,而在我身上;因为他属于那样一种人: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品质多用于民间侠客身上,偏偏他是这种侠客式的学者。所以,当他成就了这两个发现时,我们或许更应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只有像他那样的文化人才会有那样的文化发现。

千家峒问题与瑶族族源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瑶族同胞还是从事瑶族研究的学者,都对它非常关注。宫哲兵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他认为千家峒所在的湖南零陵地区是瑶族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期,这里的瑶族先民制造了石锄、石矛等先进农具和武器,培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粒性栽培稻种,创造了广西灌阳五马山文化和湖南道县玉蟾岩文化。其后,在零陵相继出现的三苗、荆蛮、零陵蛮、莫瑶,都是瑶族的先民。莫瑶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从零陵、衡阳出发,北上洞庭湖,南下广东乐昌府,东去江南,西达武陵源。宋代以后的瑶族,才开始了向南向西的迁徙。这些观点,我以为是基本合理的。每一次地理发现都伴随有理论突破,宫哲兵用7年的艰苦努力发现了千家峒的地理位置,正是发现过程中他升华了自己对瑶族族源的见解。

传统的瑶族是一个迁徙性民族,他们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食尽一山便他徙。自古以来,他们自长江而西南、华南,而印度支那半岛;越南战争以后,又从印支半岛去往西方国家,成为一个跨境的国际性民族。且支系繁杂,多达数十种。再者,瑶族本身并无文字系统,少数文本借用汉字,多数则以口传、歌咏、礼仪、图画等方式流传下来,各支系之间多有殊异。千家峒便是流传于瑶族民间的瑶族发祥地。

“峒”在《辞源》中被解释为“旧时我国贵州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统称”。千家峒正是瑶族人民祖上美好聚居生活的福地,颇似陶渊明笔下的胜景。依照民间传说,千家峒圣地与盘瓠神犬的神话彼此相连。相传千家峒里有一个山洞,洞内有一尊天然石狗,那是祖先盘瓠的化身。它直接源自一个故事:古代评王与高王打仗,评王屡败,于是布告天下,谁能打败高王就将女儿嫁他。神犬盘瓠抓下布告,乘夜色潜入高王帐内,咬杀高王。评王借势掩杀过去,大获全胜。盘瓠娶三公主为妻。他们不愿过宫里生活,经评王同意,来到了一个叫作千家峒的地方,生儿育女,他们生了六男六女,成为瑶族十二姓始祖。

千家峒的自然形貌按此分布:下峒三百三十三家,中峒三百三十三家,上峒三百三十三家,连同一座盘王庙,正好一千家,故称千家峒。瑶族人民在峒中过着“不知秦汉”的自给自足美满生活。到了元朝大德年间,一位收税官误入千家峒,受瑶民热情款待,乐而忘返。朝廷以为被瑶民扣留,派兵围剿。元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三月十九日,元年攻入千家峒。峒内瑶民集合于上峒后成出逃。出逃前,他们把平日供奉的神像、金银财宝埋在一个山洞里,把一个完整的牛角锯为十二节让瑶族十二姓分别保存,并发愿五百年后再回到千家峒来。

17年前,当年轻的宫哲兵第一次进入瑶山,当他第一次聆听瑶族老人们的娓娓诉说,当他生平第一次接受来自瑶族同胞的真诚和善意……或许就注定了他以后漫长而艰苦的探险和寻索生涯。试

想，一个人在寒冷的冬夜，在遥远的异乡，瑶族同胞为了让客人取暖，竟然在夜里长时间地把客人冻僵了的双脚拥在自己的胸前。这样的人生体验难道还不足以让客人为他们做些什么吗？所以，在以后的17年里，不管宫哲兵怎样跋涉，从西南到华南，从印支半岛到欧美国家；不管他在途中吃了什么苦楚，孤独、寂寞、饥寒交迫、“与狼共舞”；不管他是怎样独自一个人行走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还是在前往西沙群岛那波浪滔天的海路上……人们都可以从中找到情感的附丽依托和信念的逻辑根据。不论在这漫长的17年中，宫哲兵的研究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他的经历多少可以赢得人们的一些包容。人们知道，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文化体验，也没有这样的艰难经历。重要的是，他的发现正是建立于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索之上的。

我不想以情感的包容去界定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果真如此，显然极不明智。况且，任何一位学者，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者，都能够讲述许多田野作业中的艰辛，他们的学问无例外地建立在这些艰辛之上。对于宫哲兵教授破解千家峒之谜，我更愿意强调他独特的学术感悟力。中国的学术传统，似乎很忌讳将神话来传说与历史并置处理。在孔夫子那儿就有了端倪。西方则略呈不同。早在公元前400年以前的古希腊，就有哲学家乌荷米勒斯（Euhemerus）明确提出“神话即历史”并因此形成学派。至于晚近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和英国学者伊文斯根据荷马史诗、神话传说所提供的线索，发掘出特洛伊、克里特遗址，二者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地得到确认。然而，在中国，若有人真要把“盘瓠神犬杀高王，娶三公主，回千家峒，生六男六女，御救十二姓……”等传说当真一定有被人误以为“疯子”的危险。宫哲兵竟当真。这一当真便几乎耗去了他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这一当真把他携带到长达17年的文化苦旅之中。不过，仅凭建立于情感上的“当真”或许真有疯子之嫌，关键在，他的当真更多依靠的不是情感，却是学术悟性和判断力。他知道如何在空灵中把握真切，在虚幻中提炼事实。

我不想把千家峒的发现与特洛伊的发现相侔，也不把它与人类学研究中的所谓“千年运行”（以宗教预言和建立千年王国为主旨的宗教运动）相对，千家峒的找寻过程一直与瑶族民间“返回千家峒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1831年，湘南的江华县爆发了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是“打回千家峒”并配有“千家峒歌”。1933年，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地区又自发掀起了大规模的运动。四十年代再度掀起……其实，瑶族民间这种寻找家园的活动从未中断过，尽管他们的运动多数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文化寻根的一个重要策动力来自文化认同。对于一个迁徙性民族，漂泊虽然成为其显现于外的特征，却不妨碍她在族性（Ethnicity）上对“祖”（包括祖宗、祖源、祖地等）的认同需要。人类学认同研究揭示：越是迁徙，这种认同意识越是强烈。乔健先生有一部瑶族研究的著作，取名为“漂泊中的永恒”，窃以为此名极具学术穿透力和囊括力。不论我们把瑶族的“返回千家峒运动”放在文化寻根抑或是民间文化复兴上来定位，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神话传说中确认的历史部分。正是那些被确认的历史部分支持了宫哲兵的学术判断：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个瑶族祖地，它神圣而又平易，虚幻而又真切，文化而又自然。

文化寻根也好，民族认同也罢，作为一个民族性文化运动，除了对“永恒”追求以外，还少不了生存战略中的政治性要求。这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概念中的一个核心意义。对于一个具体的民族，尽管它带有某种“想象共同体”的意味，但争取应有政治性“主权”一直是现代国家民族运动的特征之一。瑶族的千家峒运动无疑没有例外。所以，当我们回眸瑶族的“免徭”（因瑶人祖先有功于国家而被免去所有徭役）情节，神犬母题，《过山榜》（又名《评皇券牒》等）文书……都能清晰地瞥见其中的政治性主旨。

瑶族的漂泊行徙和悠久历史规定了瑶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规定了其世界性。在人类学研究中，文化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瑶族的文化特征使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难得范例；

特别是一个长期栖息于大山的游耕民族骤然之间被置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弱小民族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适应、涵化、再造等,仿佛数十年、数百年的文化变迁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冲突。父亲还吟唱着瑶族口耳相传的古老情歌,孩子却驾着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父亲还有刀耕火种,孩子竟站到现代化大型企业的流水线旁……这样的文化语境使瑶族的千家峒运动又多出了一层语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弱小民族反而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自觉。我曾亲眼看见身着西装的美国瑶民手持他们祖传的“瑶人行徙图”(过山图)在瑶族祖地觅寻。对于这样的“差序”走向,诠释可以多样,但都无法阻绝事实的存在。宫哲兵教授千家峒遗址的发现既印证了事实本身,又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辟出了一个新的学术畛域。

几十年前,一个稚童曾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他在山洞里找到许多宝贝,有金银财宝和一种奇怪的文字。后来果然应验。梦境中的“山洞”就是千家峒;“金银财宝”是瑶族埋在地下的宝物;“文字”正是女书。这个遗梦者是宫哲兵,这个圆梦者还是宫哲兵。不会有人去刻意二者之间的诡谲,17年的文化探索本身即是一种圆梦。过程或许比结果更具有说明性。这,便是我所认识的宫哲兵和他的千家峒研究。

(责任编辑:章敏笑)